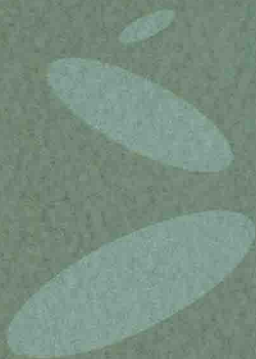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梁文道

讀者

The Common Reader



读者

梁文道_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者 / 梁文道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39-5953-0

I. ①读… II. ①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7830 号

读者

著 者 梁文道

责任编辑 齐大任

特约编辑 冯希南 李鹏程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内文制作 陈基胜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com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64279491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64204980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1.875

字 数 178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书 号 ISBN 978-7-5039-5953-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正常读者的目录

陈智德

梁文道在本书起首第一篇《你读过〈红楼梦〉吗——〈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的题目涉及了两本书，前者仅在文章第三行提及一次，后者更明言根本未读过，但梁文道仍在文中对该书评述了一番。该文真正谈论的是“书皮学”，一种不用仔细阅读却能掌握书本内容，然后侃侃而谈的学问或伎俩。说是“伎俩”，是因为它容易沦为作伪欺骗、以伪知识装点门面的手段；说是“学问”，是因为它在浩瀚书海中，尤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又的确是一种整理个人阅读系统的方法。是学问或伎俩、手段或方法，端视乎读者的心性、目的和理念。

《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Comment parler des livres que l'on n'a pas lus ?*，繁体中文译本《不用读完一本书》，2009年3月出版)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巴雅(Pierre Bayard)所著，出版后广受青睐而成为畅销书，梁文道写作该文时，英译本才刚面世不久，他还未取得该书，但凭借其知识系统和“书皮学”的掌握，仍可概述该书，而且颇为切中要领。该书以瓦雷里、艾柯、巴尔扎克等人的著述为例子，谈论书皮学的现象和历史，因为书皮学不单是一种充撑门面的社交伎俩，在作家笔下，它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角度，甚至是小说表意的媒介。该书的书名很容易让人以为它是一本提供诸如速读等阅读技巧的方法书，但正如梁文道以本身的书皮学修为所指出的，该书不是教人不读书而能作伪的指南，而是谈论一种文化现象，以及阅读的可能性。作者以集体图书馆、内在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三者作为阅读者触类旁通的门径，写出了一种阅读的抽象观念。当然，该书也多少传授了一点小聪明，教人理直气壮地谈论自己还没读过的书！这也许是它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吧。

然则，在我辈看来，书皮学根本毋庸学习，也无须方法，所有累积一定阅读量和修为、对书本敏感以至建立了个人观

念图书馆的读者而言，都会自然获得触类旁通的本领，无须通读甚至读过一书，而能略知一书的知识源流；事实上书皮学的要领亦无外乎目录学的范畴。梁文道的读书评书修为，绝非读一本诸如《不用读完一本书》这等之书可臻，尤其视作快捷方式方法者。梁文道评书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博而杂，他的首本书话集《弱水三千》，以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罗列所评之书，共分十五类，实际上是为个人博杂的知识涉猎建立体系，将其安放于观念上而不真正存在的、抽象的图书馆中，成就了我辈心中的“书痴目录学”。

作为梁文道书话之二，《读者》一书因应书评的对象，有更多普及知识的意向，造就真正坚立的“读者”。在本书原序中，梁文道以“正常读者”自许，书中却有一条目为“不正常读者”，谈及郑振铎、陈子善、许定铭、陆灏等藏书家、读书人。正常与不正常看似对立，在本书中却不然，梁文道认同也心慕那种“不正常”的藏书理念，而他本人却自许为“正常读者”，正如他在原序所说：“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也开始明白知识、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你愈是以为自己谦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这是一种对异化的警醒，愿意把知识的面向

放回人间，其理念与他另一本著作《常识》以“常识”抗衡空洞玄说的想法实一以贯之。

与前著《弱水三千》相比，本书同样建构了一座虚拟的图书馆，但有更多人间气息，他孜孜论书的对象不是作者，而是在知识流动的长河中，与作者位置同等的读者。我相信，这种贴近人间、普及知识的阅读态度，并非一蹴而至，而是梁文道多年来藏书读书和从事媒体工作的体认。

在我眼中，梁文道可是个不折不扣的“不正常读者”，在中学时代，我们都不满足于课业范围内的“常识”，因而自行到书店和图书馆寻找真正值得探求的事物，开列属于自己的书单。他的书单以文化理论和哲学为主，也涉猎不少文学。那时内地知识界正值“文化热”时代，香港的书店可找到不少内地出版的文化理论著作和翻译，如“走向未来丛书”，梁文道就是最早向我推介这套书的同学，他又介绍我读福柯、谈论女性主义、批判电视台的选美活动，此外他也热衷于前卫剧场，有一次捎来一叠稿纸，是他新近写成的剧本……我也不甘落后，向他介绍杨牧最新出版的诗集和我自己写的诗，我们就这样在课余交换阅读情报，那时，我们还未知悉，这样的阅读会怎样染织我们的人生，留下斑驳的纹

理、脱落的毛线。

那时我已知道他在《信报》的“戏间形采”专栏不定期发表剧评，在《电影双周刊》的附刊“阅读都市”与汤祯兆展开笔战。上世纪90年代初至中，梁文道在《越界》发表更多艺评、杂文与人物采访，我也一篇一篇地跟着读了，后来，他先后参与创办《打开》、牛棚书院、《E+E》、《读好书》和《读书好》；我自己也和别的朋友先后办了《呼吸》和《诗潮》两份刊物。除了《读书好》之外，我们都耳闻目睹以上的刊物和朋友如何凝聚然后消散，一个一个与之相关的文化议题如何热烈讨论，又一再由于经验断裂而在不同场合从零开始重复展开，这轨迹仿佛也是香港无数前代文化人的轨迹，所不同的，是梁文道在精致、前卫与普及、通俗之间，愿意以更柔韧的心力接近于寻常巷陌人间，相信这也是他创办“牛棚书院”的民间办学理念并一直沿用“牛棚书院院长”名号之所由。

逝者如斯，大断裂当中，阅读似乎成了少数得以延续的精神活动。阅读本书的关键，与《弱水三千》一样，在于梁文道对知识的分类。如果读者家中也拥有为数不少的藏书，就会明白分类的重要性，甚且，有时分类的意义还不仅在于

便于搜寻，而更在于分类者为知识所赋予的观念。藏书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berto Manguel）在《深夜里的图书馆》（*The Library at Night*）一书中，描述了各种私人藏书和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分类以及当中的趣闻，其中私人藏书往往有许多异想天开的分类法，有一位作家以各种颜色纸包装书籍封面并作分类，如小说用蓝色、西班牙文用红色等，使其书房一眼看过去有如几度彩虹。曼古埃尔还记述他的书痴好友们各种古怪的图书分类法，如把兰波的诗集《醉舟》列于“航海”之列，把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学：生食与熟食》列作“烹饪”一类！

书痴们的古怪分类不是一种望文（书名）生义，而是出于玩笑和重新安放知识之雅意。古怪的分类其实不止于私人藏书，曼古埃尔留意到公共图书馆的分类也有离奇的类别，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里，主题标题中还包括有“香蕉研究”、“蝙蝠皮装帧书籍”、“艺术品中的靴子与鞋子”等类别，这是图书馆编目员的创造性杰作，曼古埃尔认为，“简直就像是对这些编目员而言，书籍内容还不及它们所归类主题的独特性来得重要”。

其实，对书籍分类的观念意义知之最切、用功最深者，

莫如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家，从《七略》以六经即儒学为中心，演变至“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古代目录学除了反映社会思潮流变，也标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发表《西学书目表》，把其时所见之译著分为西学、西政、杂类三项，西学类又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等，约相当于清末维新派新政的内容；《西学书目表》作为一份书目，既有配合新政的经世意图，亦抱持以西方科技结合人文社会科学来改革中国的理念。

梁文道首本书话集《弱水三千》依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的纲目，为个人涉猎建立体系，评说的对象是书；本书以“准备做一个读者”、“不正常读者”、“政治花边”、“经典常谈”和“学点文艺腔”、“常识补充”和“都世界杯了，你还读书？”共七项作类别，评说的对象是读者，在梁文道看来，政治、经典与文艺、常识固然同等重要，但更要紧的是作为一个“读者”的自觉。与一般消费性或功能性阅读不同的是，本书所要造就的“读者”指向抗衡宰制和蒙蔽的自主，姑不论谈论自主书商的《壮哉万圣》、关注内地女工的《打工妹的声音》、坚守言论自由的《十博士大战于丹》等文，在最后一辑与足

球相关的书评中，梁文道举引多种书籍，由足球谈到反全球化，也谈论纳粹德军占领乌克兰时期，球员因坚守尊严和自主而被处死，《世界不是只踢一种球》、《心物不二说足球》等文谈论足球运动真正的趣味及其勇猛的精神理念，批判商业行为带来的异化；该辑文章由足球读出自主、抗衡和批判，它绝不由犬儒和玄说而来，实基于坚实的阅读系统，这样的“读者”才得以强立于流变和断裂中。

由此理念，《读者》一书不妨视作我心目中的“现代目录学”之一种。在古代的目录学相关著述当中，有一种称作“藏书纪事诗”，记录藏书家遗闻轶事，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谈及清代藏书家冯舒冯班兄弟，冯班“为人傥荡悠忽，动不谐俗。胸有所得，辄曼声长吟行市井间，里中指目为痴，先生怡然安之，遂自署曰‘二痴’”。冯氏藏书素以异本闻名，最著者为《文心雕龙·隐秀篇》手抄本，惜后世子孙不甚爱惜，“即宋元精版，尽化为胡蝶飞去”，叶昌炽题诗云：“沧海横流自闭门，莫城西畔有孤村。篋中隐秀何须秘，化作春风蛱蝶魂。”夫文体代降，诗形代迁，兹谨以新撰“藏书纪事新诗”一则，演化梁文道《读者》一书之理念：

阅读人间（梁文道《读者》）

陈 灭

叶片掉落如书页飞翻
我们的作者步过裂缝
步过枯草织就的人间
灰烬与硝烟化作霓虹
你把它熄灭又轻翻书页
换取另一房间的光容
一切流逝都由阅读而复现
我们的读者不就是我们
窗格下疾书浮出的话圈
悠悠飘过都市，未破灭前又听见
横巷间的暗语是犬吠还是哭声？
列车划过，删去车站前流浪艺人的歌声
只有读者为都市编就的书页与尺牍
一所抽象的图书馆与一串话圈，编了目录

2009年8月10日志

自序

正常读者

英国评论杂志《前景》(Prospect)在2008年初的时候做过一个特辑,找来一批人评选前一年最被高估和最被低估的事物,其中当然包括了书。一位记者选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年代》(A Secular Age),他认为一般媒体都忽视了这本书的价值。查尔斯·泰勒是最重要的在世哲学家之一,而这部厚达九百页的皇皇巨著则被誉为他一生中的最高成就。或许大众媒体忽视了它,但学术圈可没走眼,此书一出,不只得到许多专业期刊的评论赞扬,还拿下了一座人文学界的大奖。

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为什么主流媒体忽视了这本分量奇重的大书，而是那位记者，一个本身就是替《金融时报》、《卫报》和 *Time Out* 等主流媒体供稿的传媒人，为什么会看上这么难啃的学术专著？

《经济学人》、《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在香港拥有不少订户，它们的长期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英语主流刊物的记者和作者皆非泛泛之辈，平日一篇报道固然看得出功底，偶尔出一本专题书也是文字可读，内容扎实，明显下过一番工夫。难怪市面上许多畅销的“非虚构”（non-fiction）书籍都是记者手笔。无论是谈全球暖化，还是讲印度的崛起，都跟得上学界的最新成果，同时还照顾到了一般读者的程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在看过这么多的示范之后，我起码学懂了一件事：原来这就是正常的水平，原来国际水平的传媒人是这样子的。

最近两年常在大陆活动，其中一件最叫我尴尬的事就是老有人称我为“学者”。所以当我看到有人在博客上留言给我，说“你算哪门子学者，你只不过是个‘伪学者’，是个传媒人罢了”，我就大大松了一口气。对极了，我连硕士都没读完，

又怎能僭用“学者”之名？我只不过是个传媒人，在报刊发稿，在电视台做节目，如此而已。

和那位喜欢查尔斯·泰勒的记者一样，我也会花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学术论著；但我绝对写不出那种书，甚至也不够格去为它们写一篇专业的书评，因为我是一个传媒人。做一个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意见，应该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解自己正在谈的话题。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假如连我们都不看这些东西，那么学者们的苦心又有何意义呢？我不专业，不能在所有课题上投下长年的心血，只能泛泛而读，什么东西都得摸一摸。然而，这是个基本责任，如果我根本没读过任何讨论民主化问题的材料和书籍，又怎么能去评论香港的民主进程？读者又凭什么要看我的文章？

读书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后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让我知道一点社会的脉动，了解身边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对镜头和稿纸的时候觉得比较踏实。既然是工作，自当全力以赴，所以我每天都花不少时间看书看杂志。这么多年下来，竟然被一些朋友误会为“读书专家”，别人找我去办讲座谈心得

也就罢了，自己竟然也“当仁不让”地弄起了读书节目与读书杂志，好像还真是回事。可是我打从心底知道，我只不过想努力做好一个达到正常水平的读者罢了。

或许根本没有所谓的“正常水平”，可我自己有把简单的尺子，那就是看不看得懂人家在讲什么。二十多年前看台湾的《当代》杂志，里头有一半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那种感觉很难受，为什么那些人老是说什么“众所周知，解构主义的初次登场正好是在结构主义的高潮时期”，或者“有名的韦伯论题到底能不能适用于东亚的情况呢”……似乎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晓得解构主义与韦伯论题是什么。类似的智性屈辱，我后来还一再地在其他报刊上领会到。除了我，每个《信报》的读者好像都能理解高斯怎样分析公司的出现；除了我，每个《百姓》的读者都对遵义会议了如指掌；除了我，每个《读书》的读者都晓得陈垣的史学成就；除了我，每个《纽约书评》的读者都烂熟《在路上》的一字一句；除了我，每个《电影双周刊》的读者都看遍了戈达尔的电影；除了我，每个《时代》杂志的读者都能理解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来龙去脉；除了我，每个《新科学人》的读者都懂什么叫

统一场；除了我，每个《南方周末》的读者都对中国的户籍制度了然于胸……

据说这都是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也都不算是特别艰深的专业期刊，那么我为什么会不知道那些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呢？最令我介怀的，不是那些文章、那些报道的主题有多深奥（恰恰相反，它们一般都写得很浅显），而是它们的作者总是很轻松地东引一句话，西摘一个名字，然后也不多加说明，仿佛这是圈里人全都明白的常识。我努力阅读，原动力就是想获得这份常识而已。假如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我怎么能站在媒体的平台上和人家平起平坐呢？

后来有人告诉我，隔行如隔山，说不定一个《读书》的作者连一份《新科学人》都看不下去，你又何必苦苦追求那种幻觉般的常识呢？可是我又不服气了，《新科学人》明明是科学界的流行读物，怎么能轻易容许自己看不懂呢？再说，《读书》作者群不乏资深的老学者，他们自己可以说自己“隔行如隔山”，不必知道物理学的新进展，但我们干媒体的本来就要什么领域都浅尝一番，这种话是不该随便讲的。

也有人说，《卫报》和《纽约时报》里有国际级的大评